

品读江西

依然星子闪耀

□ 刘 华



从前的星子县很小，仿佛陨落的一颗小星星，论人口，曾是全省倒数第二，穿过县城也不过抽一支烟的工夫。可历史上它却是文化巨星辉耀的地方。该县栗里村乃陶渊明故里。他醉卧的地方，他采菊的地方，他悠然望见的地方……从前去，朋友介绍得很细致，朋友是他的乡亲，是他的诗友，甚至是他的酒友，好像刚从他身边酒醒似的，一手指认陶公行迹。朋友也是周敦颐 and 朱熹的忘年交，领着我数度流连于爱莲池畔紫阳堤上，宋代两位理学大家先后在此任知南康军，的确叫人引以为豪。

从前的星子人总是夸耀：庐山之美在山南。所谓山南，即庐山南麓，它有庐山的多处著名景点，秀峰呀三叠泉呀观音桥呀太乙村呀白鹿洞书院呀，还有久负盛名的温泉。那时坐班车去星子县城必走温泉过，但见右侧山溪里热气腾腾。

好了，山南山北不必斗嘴了，2016年，庐山风景区一改“一山四治”局面，撤销星子县而设立庐山市。打那以后，星子县仅存于历史沿革的文字记载，不过，我的记忆里依然星子闪耀。

星子也是鄱阳湖观鸟的好去处。年年为之动过念头，可是一耽搁，便是冬去春来。殊不知，候鸟是不等人的，片刻都不等。

有一年春天赶到吴城。湖天茫茫，鸟影寥寥，只有几只白鹭踏水而行，似在收拾白鹤天鹅遗落的羽衣。它们张望于草洲，搜寻于苇丛，突然飞了起来，却不知飞向谁边。几多落寞，几多惆怅。而圈养的一对天鹅呢，它们眼里的感伤犹在，离情依依。那一切让我相信，候鸟大约是一天告别鄱阳湖走的。候鸟悄悄飞走，正如它们悄悄道来。

错了。候鸟的到来和离去，都是热闹非凡的，壮丽无比的，就像我们的节日，我们所经历过的最为隆重、最为难忘的典仪。摄影家为我描述过那不可思议的场面。

初冬的鄱阳湖仿佛辽阔广场。所有翅膀纷至沓来，从东北西北，从西伯利亚蒙古日本朝鲜，从一个泽国到另一个泽国。候鸟不约而同选择到达的日期，那是摄影家掐算中的日子。候鸟首先齐聚于主湖区，举行到达的仪式，盛大的联欢，庆贺成功的抵达，友好的重逢和亲情的团圆。白鹤的方阵，天鹅的方阵，东方白鹳的方阵，鸿雁的方阵……它们快乐地歌唱着，激动地叙说着，或者，它们的歌唱本来就是叙事长诗，叙说遥远的草原、沼泽和荒野，叙说去年的离愁别绪，去年的怀想如梦，以及此刻的美梦成真。仪式之后，各种鸟一群群地去找各自的家园。它们冬天的家园，分别在各座小湖或港汉里。

而告别候鸟的鄱阳湖，就像一座机场，一座车站，一个码头，就像我们为亲人送行的每一个现场。整个水乡泽国都在为它们送行。候鸟们不约而同地启程，正如它们不约而同地抵达。它们从各自的家园各自的港湾起飞，约定一般，都在鄱阳湖上空反复盘旋，一圈又一圈，盘旋在自己的歌声中，盘旋在大地的眼睛里。此刻，它们的啼鸣催人泪下，因为里面有万般缱绻。然后，便是分道扬镳，各奔前程。

星子的沙湖山是天鹅的家园。我去的时候，天鹅们也许刚刚离开联欢会现场，一个个的，仍沉浸于万鸟来朝、众声欢鸣的情境之中，仍在放声歌唱。嘹亮的歌声、铿锵的和鸣，具有金属质地、金属光泽，穿透密密的芦苇丛，飞扬在整个湖湾里。远远的，尚未见着湖，我便听到了天鹅唤鸣。我说，这么热闹，好像中央电视台“心连心”剧组来了吧？成千上万只天鹅闹出来的动静，的确营造了心连心的氛围。

芦苇在湖滩的这边，芦苇是天鹅的篱笆；水岸在苇滩的那边，水岸是天鹅的庭院。天鹅在自家的庭院里排练，我在天鹅的墙外、窗下眺望。芦苇丛中的我，成了踮起脚尖的一杆芦苇，或眯着眼睛，看起珠帘，便是精美绝伦的《天鹅湖》。成千上万只天鹅聚集在一起，真个仪态万千。一群群的，仿佛在温习昨天赶排的集体舞；成双成对的，或以喙相碰，或以头相靠，大约是忙里偷闲说几句悄悄话；三三两两游离群体的，应该是找僻静处练嗓子去了；至于那些把头钻入水中觅食的天鹅，在我看来，它们一定是正在给自己换上新舞鞋。

天鹅成群结队游弋于湖上的情景，不仅令我联想到那出著名的芭蕾舞，也让我恍然：为什么人们把候鸟王国鄱阳湖，称之为“中国第二长城”。所谓“第二长城”，大约是用来比喻令人叹为观止的“白鹤长城”的，其实，当成千上万只天鹅那么优雅那么自在地沿着水岸铺展开去，何尝不是一道气势磅礴、蜿蜒逶迤的天鹅长城呢？那是以有翅的船队筑起的长城。

法国科学家、作家布封在其名篇《天鹅》里对天鹅之船有生动而细腻的描述，说它头颈像破浪

前进的船头，宽广的腹部像船底，身子前倾像船舳，尾巴是地道的舵，脚是宽阔的桨，“它的一对大翅膀在风前半张着，微微地鼓起来，这就是帆，它们推着这艘活的船舶，连船带驾驶员一起推着跑”。

何止是跑起来呀，它们连船带自己都飞了起来。不知是受到惊扰呢，还是风怂恿的，尽管湖上无边宁馨，却时有一些天鹅突然在水面上向前冲跑一段距离，然后起飞，飞翔时长颈前伸，缓缓地扇动双翅。而更多天鹅依然从容栖息水上，它们庄重地伸直脖子，欣赏别个兴致勃发的飞行，就像品味自己雍容高贵的仪表。所以，一次次起飞，不过是短暂的表演。

沙湖山的天鹅，有芦苇作篱笆，可以潜入其中，小心翼翼地接近水岸，接近它们的呢喃和鼾声。别处则不然。

我曾为沙湖山之行写道：通灵的鸟啊，多像人类，多像我们自己。

“奇石老人”则是鄱阳湖畔最坚执的“留鸟”。他居住的青山古镇，街邻早已不再是店铺客栈酒楼茶肆，而是杉树樟树柿树以及茶树和杂草；他的客人再不是来往于鄱阳湖上的船工商贸官员和诗人，而是常年寄居在那里的鸟与兽。

连废墟都湮灭在草木之中了！他家作为唯一住户，连老伴和五个儿女都搬迁到山那边的新居去了！当时已六十六岁的倔犟老人，仍独自在此守望一个六十岁的梦。

加起来一共只读了三百天书的老人，从孩提时，就梦想着“寻找真相”。我听不懂星子方言，再三追问什么叫“真相”。原来，他指的是化石。

对了，化石里生长着真相，珍藏着真相——关于宇宙和地球，关于海洋和陆地，关于自然万物和我们自己……那是怎样绚丽的真相啊，竟让一个孩子痴迷的寻找中不知不觉变成了老人，竟让一个渔民总在卸下满舱雷电后又划向浪涌的彼岸，竟让一个老人夜夜醉卧在漫长的孤独里？

他以收藏鄱阳湖奇石而渐为世人所知晓，时有各色人等不辞辛苦登门造访。大约先有媒体为之命名，随后他乐享其成，索性也自号“奇石老人”。渔民居然成了收藏家！

殊不知，寻找是有凶险的。比如，久远的爆炸，始终回荡在他的记忆中。那年，为抵御日军入侵，鄱阳湖的一些水域布下了水雷，“奇石老人”的大哥便捕得一枚，二十岁的年轻渔民心想，拿这玩意儿做几个米缸倒是挺好。于是，与伙伴一道把水雷拖到湖滩上，操起家伙，砸呀砸，硬是把它给砸开了瓢，成就了两口米缸。随后，他大哥又拾到第二枚水雷，幸运不再庇佑，一阵猛砸，水雷爆炸，三条生命化作腾空而起的一团黑烟。

化石虽不至于爆炸，但它们总是藏在恶浪的血口之中、怒潮的利齿之下，狂风暴雨才可以让它们现形。所以，打风暴的日子正是寻找化石的好时机。每每风暴未曾消停，老人便已驾舟出行。有时候，化石则是毒蛇的眠床。我从他右臂上看到十分新鲜的蛇伤。我采访他的时候，咬伤他的眼镜蛇正趴在他的小院里，和我一样，直起脑袋用心听着他的故事。

那么，他穷尽毕生，甚至不惜身家性命，究竟得到一些什么宝贝呢？厅堂厢房厨房，到处摆放着石头。我不懂石头，在我看来，奇则奇矣，却非想象中的那般动人。老人舀了一瓢水，往一块大石头上浇，化石显露出它的“真相”。上面密密麻麻地镶嵌着大大小小的管状、螺帽状物，构成奇异的纹饰。像金属，也像螺贝及某些海洋生物的骨骼。也许，它就是鄱阳湖生成的见证？

可是，老人随后从塑料袋中掏出的石头，又让我以为不然了。他认为那是某种动物骨骼的化石。对此，我内心生疑。因为，我屡次在湖滩上行走，也曾为拾得类似石头而欢呼，向导却冷酷得很，说那不过是陶瓷残骸而已，比如茶壶把手或碗底。是的，水能够对付一切坚硬材料的雕刻师。

我不禁暗自担心：老人是否果真找到“真相”，其全部收藏究竟有多大的价值？对于显然缺乏赏石常识的渔民来说，他评判奇石的标准大约就是自己的直觉和幻想吧？它们可靠吗，总不至于让他碌碌终身而一无所获吧？

老人却自信得很。他用别人为某块化石所给出的价格来坚定自己的信心。他的自信感染了我。是的，不要嘲笑他几近偏执的性格，即便那些珍藏并无多大价值，他的执着，难道不是人类面对喜怒无常的大自然所应取的探究态度吗？那种探究，是一种抗争，也是一种热爱。

我相信，从六岁开始痴迷于寻找“真相”，一定与鄱阳湖区广泛流传的关涉地震的“鳖鱼翻身”传说有关。□□相传的民间文学，养育了情感丰富、充满想象的人类心灵……几年之后，老人作古。可他热衷收藏的事迹，却是耐人寻味。

不大地方，故事不少。就连通常干巴巴的县志里都有妙不可言的故事，我索性把它搬回家细读。

一则说，日军入侵，星子沦陷，县政府避难迁去都昌县的三汊港。乡间倒是歌舞升平，星子义和班与都昌文词班同在阎王庙戏台演出，打擂台似的，文词班演出观众如涌，而义和班门可罗雀。后星子义和班改演别的剧目，场下情形骤然反转，都昌文词班居然不得不停演了。在生死大战的背景下，两家戏班偏安一隅，相互比剧情斗技艺争扮相，赢得观众后，星子县长喜不自禁，特地奖励义和班景德镇瓷碗一套。《西河戏》一书中介绍名师黄纪进的文字印证了这一史实，称“当天公演《辕门斩子》和《纪信替死》，由黄饰演主角杨延昭和纪信，一连三晚，戏票抢购一空，观众满座”。两出剧目，前者为杨家将故事，杨延昭欲斩亲生儿子杨宗保，只因大敌当前“儿命他领人马巡查边界，谁叫他穆柯寨私配裙钗”，后者说的是楚汉相争时将军纪信不惜牺牲自己以掩护刘邦脱险事迹。既然如此，于战火硝烟日益迫近之际，我想，真正帮助星子义和班赢得民心民情的，应是戏台上表现出来的忠肝义胆和凛然正气吧？

在戏台上饰演主角的黄纪进，也是自己命运的主角。他后来被乡里推为伪商会会长，“实则为抗日游击武装做了不少事情，日军投降那一年，黄因汉奸嫌疑被旧政府拘留，拘留期间黄编了一段戏文以作补充交代，戏文有：‘救过生命有多少，怎见有人记心头。回想个人事却小，中国恢复一切可罢休……’”县政府认为情况属实，即令将黄释放并恢复演出”。从前走访湖区，屡屡听说老百姓营救飞虎队、僧众及游击队保护古画《五百罗汉图》故事，还有一个智斗鬼子的民间传奇挺可乐的，表达了湖区人民对侵略者的切齿痛恨。而黄纪进的经历，更是反映了当时斗争形势的严峻，可惜细节已无从挖掘。

戏班在乡间打擂台的场景，让我不由联想到星子一位老作家的小说。早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，他以独特视角，描写战争环境中的美丽哀婉故事，不少篇幅给我留下深刻印象，比如娓娓道来的《窃窈》。其爱情故事恰恰发生在日军进犯的枪炮声中，一边是两军对垒的殊死搏斗，一边是鼓声不绝的唱弹戏；一边是游弋的兵船，一边是迎亲的队伍。当村庄沦陷时，一对新人却冲进村去匆匆拜堂再撤离。他在小说里，总是把战争信息处理得隐隐约约，把乡村日常生活写得饱满浓郁，战事的紧张仿佛只是反衬和平生活的从容舒缓，从而凸显人们的生活态度和生活信念。那是一位有想法有个性的小说家。

县志里的另一则故事更是惊心动魄。说的是，日伪县政府为标榜“大东亚共荣”，要求星子大戏艺人在县城里演“端午戏”，结果艺人们宁死不从，纷纷逃亡他乡，或改操皮影戏，或另谋营生。据《西河戏》记载，义和班有一位叫汤再树的名师，其“天资敏捷，才智过人，能演古，能排剧，无中生有，愈出愈奇”，因而被誉为“夜官”，然“抗战沦陷之中，汤无处可排演，终守家中，不得遂意。忧郁成疾辞世”，令我大加感慨的是，在抗战胜利之日，大戏艺人不约而同从各地冒了出来，聚集县城旧府堂门前戏台上，连演大戏《大审玉堂春》三天三夜以为庆贺，场场人山人海，掌声如雷。此心此情此景，可谓感动天地。为什么是这一出戏呢？我好不容易在史料中找到答案了，当时台柱上的戏联只是说：“清君城中竟是谁家天下？惟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！”好个汉官威仪！岂料，后来的国民党政权以禁赌之名行“戡乱”之实，严厉禁止民间演出大戏。我对这段史实兴致勃勃，曾行走乡间，观摩乡戏，采访了多位艺人。星子大戏于1979年正式得名西河戏。

星子县志里吸引我的第三个故事，乃一个伪县长的小故事。日军进占星子，“故意逗留境内甘作傀儡”的他组织民众手举小旗出城迎接，因此摇身一变当上伪县长；日本投降，他领人“身着衣冠立道旁”“鞠躬行礼”，迎接流亡乡间的国民党县政府归来，后以汉奸罪被判，不过很快就被国民党委任军事职务，依然是“不倒翁”；人民解放军即将进城时，他故伎重演，再次组织民众欢迎，岂料，此次投机不成，他终于迎来人民的审判、正义的枪声。戏乡的人物也这么有戏！正应了西河戏《徐策跑城》里的一段西皮摇板——

湛湛青天不可欺呢，未曾起意有神知，他善善恶到头终有报呢，匡七，匡七，匡七，匡匡，只争来早与来迟。

星子往事闪烁于记忆深处。不，它们好比落星墩，好比横贯鄱阳湖可以通达都昌的千眼桥，哪怕潜藏万顷波涛之下，也昂然耸立着或横亘着……

用笔行走

造福之地

□ 毛江凡

打开中国版图，在湘西腹地，武陵山脉与雪峰山脉之间，被誉为“福地之城”的怀化，安然坐落于灵山秀水之间。

时值初秋，行走在这片土地上，但见沅水潋洄其间，青山重峦起伏。据记载，宋时，朝廷以“怀柔归化”之意，始设怀化砦，怀化之名由此得来。作为“黔滇门户、全楚咽喉”的怀化一直是中国中东部通往大西南的“桥头堡”。

巍巍雪峰山下，悠悠沅江水畔。当我的脚步在历史与现实中穿越，总能触碰到不老的时光里，这方大地上那层层叠叠的文明肌理——高庙陶器上的凤鸟振翅欲飞，二酉山中的竹筒熠熠生辉，长征路上的转折惊心动魄，稻花香里的芬芳翻涌成海……我相信，怀化之“福”，绝非虚妄之美誉，实乃穿越八千载风雨仍璀璨绚丽的生命印记。

风起高庙 福之肇始

沅水汤汤，携着远古的讯息奔流不息。7800年前，高庙先民在怀化这方土地临水而居，制陶渔猎。在高庙遗址博物馆，其中最令人惊叹的，便是一只展翅欲飞的凤鸟。羽冠高耸，长尾逶迤，那是中国凤凰雏形最早的飞翔，比中原地区的凤凰图腾早了整整三千年。

若细思量，这凤鸟并非简单的装饰，而是先民对天地、对幸福的原始祈愿。在万物有灵的年代，他们仰望苍穹，渴望如飞鸟般超越凡尘的束缚，抵达光明与自由的彼岸。高庙遗址中出土的凤鸟白陶，其纹饰之精美，意象之超凡，震惊后世，被考古学家誉为“中华第一凤”。

而怀化古称“鹤州”，亦是与福结缘的明证。鹤，在中国文化中乃长寿祥瑞之灵禽。至今，怀化市区内仍存鹤鸣洲，林木蓊郁，白鹤时而栖息其间。临水而立的观鹤楼，飞檐如翼，仿佛随时要携着这座城市的祥瑞之气凌霄而去。如今，每当冬季来临，鹤鸣洲的芦苇荡里，不时仍有白鹤的低吟。而当它们展翅高飞，洁白的羽翼掠过观鹤楼的飞檐，那优美的弧线，恰似《诗经》中“鹤鸣于九皋，声闻于野”的祥瑞隐喻。

书藏二酉 福之血脉

公元前213年，秦始皇焚书坑儒，华夏文明面临空前劫难。秦朝博士伏生，冒死将千余卷珍贵典籍装车南运，藏于怀化沅陵县的二酉山中。“藏之名山，传之后人”，这一壮举，使得先秦的文化火种得以在暴政的烈焰下幸存。

“学富五车，书通二酉。”自此，二酉洞仿佛一座永不熄灭的灯塔，在历史的暗夜里守护着文明的微光。当劫难过后，这些典籍重见天日，如同种子般撒向神州，滋养了此后两千年的文化发展。

但我站在二酉山，仰望这座神奇的中华书山，我看见一场隆重的书山祭拜仪式正在举行。大家情不自禁地参与其中，吟诵《书山赋》，一起祭书圣，取圣火、传薪火，见证了二酉书香文化与文明的厚重性。这股绵延千年不绝的文脉，是怀化福地底蕴中最坚韧的一根筋骨。

书山巍峨，文脉绵长。在这方土地上，在刘禹锡、林则徐、沈从文、黄永玉、金庸笔下，远古的诗情迸发新生之力，引领着今日的我们求真问道、探索未知，共同感受中华文脉的赓续和传承。

通道转兵 战略转圜

历史转瞬而过，时光穿越到现代。1934年12月，中央红军长征途经怀化通道县时，面临前所未有的绝境。经过惨烈的湘江战役，红军已从八万余人锐减至三万，士气低落，前途迷茫。而当时掌握军事指挥权的博古、李德，不顾敌情巨变，仍坚持原定计划，执意要北上钻入敌人的包围圈。红军命运，悬于一线。

12月12日，一场关系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紧急会议在通道县恭城书院召开。毛泽东同志根据敌我态势，力主放弃北上，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。这一主张，得到了周恩来、张闻天、王稼祥等多数同志的支持。最终，中革军委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，下达了“通道转兵”的命令。

这一转，于绝境中撕开了一条生路，避免了红军可能遭受的灭顶之灾。它不仅是一次军事路线的改变，更是一次思想路线的初步觉醒，为随后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、毛泽东同志重新掌握军事指挥权奠定了至关重要的基础。

站在通道转兵纪念馆前，历史的厚重感扑面而来。在这里，时光仿佛倒流，让我得以近距离触摸那段峥嵘岁月的脉搏。它之所以被赋予非凡的历史意义，体现在历史关键时刻的战略抉择上，体现在对中国革命气运的深刻改变上。

稻涌安江 福泽天下

怀化之行，深感怀化之福，不仅关乎精神与历史，更切实地滋养着天下人的肠胃。怀化作为杂交水稻的发源地，从“让天下人都有饱饭吃”的初心，到“禾下乘凉梦”的抱负，袁隆平“一粒种子改变世界”的征程，不仅是温饱之路，也是人类奇迹。

水稻，养活着世界几乎一半的人口。一朵小小的稻花，因为雌雄同株，曾经让育种专家们利用杂种优势成了奢望，甚至绝望。在洪江市安江镇，有一所看似普通的学校——安江农校。在这里，一位名叫袁隆平的青年教师，开始了他人生长达37年的守望。

20世纪60年代，饥饿仍是笼罩在中国乃至世界之上的阴云。袁隆平在安江农校的试验田里，偶然发现一株“鹤立鸡群”的天然杂交稻，由此萌生了培育高产杂交水稻的惊天设想。科研之路荆棘密布。然而，他带领团队历经无数次失败，最终在1970年于海南发现那株关键的“野败”雄性不育系，为杂交水稻研究打开了突破口。

1973年10月，在第二次全国杂交水稻科研协作会议上，袁隆平正式宣布籼型杂交稻三系配套成功。他选育的“南优2号”，成为我国第一个大面积生产上应用的强优势组合。1976年，全国籼型杂交稻种植面积超过200万亩，普遍增产两三成。

这条路，袁隆平一走就是一辈子。从湖南到海南，从广西到云南……多少稻田里留下了他的脚印和牵挂。他的论文，写在了祖国的大地上。

杂交水稻的大面积推广，不仅让中国人将饭碗牢牢端在了自己手中，更惠及全球数十个国家，为数以亿计的人口解决了饥饿问题。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报告上，“杂交水稻使全球饥饿人口减少三分之一”的描述，恰似当年试验田里最饱满的那穗稻谷。

溯流光之河，怀化之“福”，脉络清晰，意蕴磅礴。这种种福泽，层层叠叠，交织融合，共同构成了“福地怀化”的深刻内涵。它绝非仅是地理上的得天独厚，更是历史与文明的深厚底蕴，更是无数先辈用智慧、勇气、追索与汗水浇灌出的精神之花。